

如何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时期

□邱华林 驻京城

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的政策，严禁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企图使苏区陷入“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虻蜂蚂蚁之通报”的绝境。一时间，中央苏区出现工业品奇缺、农副产品滞销、价格上涨和剪刀差扩大的现象，军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危急关头，党领导苏区军民克服困难、勇于开拓，打响了对反经济“围剿”的主动仗。

发展赤白贸易

起初，私商利用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对军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几乎全部掌握了苏区的进出口贸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主张必须由政府管理进出口贸易。1933年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并在赤白交界地带下设赣县江口、汀州、会昌筠门岭、罗塘4个外贸分局及10个采办处，形成了一个有总局、分局和采办处的对外贸易网络。当时，赣州城内最大的商号是“广裕兴”，其后台是广东军阀李焕奎和陈济棠。江口分局派人与“广裕兴”秘密洽谈，订立采购协议，组织货源。此举让江口分局的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正当外贸兴旺之时，赣州城里的商人发现苏区只能支付土造的“大头洋”“小头洋”，支付不了白区市面流通的“老鹰头”，白区商人渐渐不来做生意了。为打破僵局，外贸人员冒着危险去白区上海采购造币机。采购回来后，造币厂的同志很快造出了一大批“老鹰头”的银洋，对外贸易迅速恢复起来。

在交易中，党和政府实行灵活宽松的外贸政策，鼓励各种私商“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以发展苏区的社会经济。由于政策合理，经营得法，1933年8月至10月，对外贸易局以1万元资金和2000担谷子作资本，做到进出口33万担谷左右的商品流通。对外贸易中，大宗的出口是粮食和钨砂，粮食出口每年大约有300万担谷子，矿石出口每年大约为300万担。大宗的进口是食盐和布匹，每年买进食盐价值约900万元，布每年买进价值约600万元。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

有效调剂了苏区的商品流转，保障了军民生活的物资供应，为反“围剿”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开展节省运动

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各种医院、各级苏维埃政府及群众团体相继建立，红军队伍的日益壮大，给苏维埃政府造成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左”倾军事路线影响下，军费开支大量增加，红军筹款减少，这使得本就困难的苏区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1月，毛泽东发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的号召。同年3月，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4个月节省经费80万元的公开倡议，这些号召和倡议吹响了开展节省运动的号角。

节省运动期间，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带头节省。按规定，毛泽东夜晚办公可以点3根灯芯，可是他坚持只点1根。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时，睡的是门板床，再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床很旧的毛毯。张闻天下乡期间自带装有番薯的草编饭袋，拒吃消费合作社的客饭。被群众称为腰缠万贯“讨米人”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回家背米到机关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在领导同志的示范带动下，苏区军民纷纷跟进效仿，自觉开源节流过“紧日子”。江西省保卫局同志节省出150余双布麻草鞋；兴国横江、杰村、社背三乡节省150余担谷子借给红军，不要政府的收据；工农红军第六医院全体伤病战士自愿节省伙食费5分，一个月内节省近千元；博生县工人群众自动退还公债超1100元。由于干部群众热情高涨，1934年4月至7月，中央各部在需增加开支的情况下，比2月减少开支625876元、节省款项87896元，节省总计超过130万元以上，超额完成了4个月节省80万元的目标。节省运动的有序开展，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运行成本，有力支援了反“围剿”战争，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创建合作社

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奸商的操纵，中央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等日用品十分缺乏，而富余的大豆、稻谷、茶油等农产品又不能输出，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为了调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不为商人所剥削”，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就应运而生，大量涌现。为推动合作社规范运行，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颁布《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合作社工作纲要》《发展合作社大纲》等多项法令，对合作社的组织原则、社员权利、盈利分配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使苏区的合作社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据1934年2月的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中，我们在消费、粮食、生产三种合作社上面，发展到2300余的社数，57万余的社员和60万余的股金”。合作社的蓬勃发展，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打击投机商人盘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两大障碍：一是劳动力问题，二是耕牛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苏维埃政府成立劳动互助社，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犁牛合作社，解决耕牛缺乏的困难，使农业生产初见成效。1933年赣南闽西区域的农业生产比较于上年增长了15%，而闽浙赣边区区域则增长了20%。仅永丰县，1933年全县全年的收成，比去年增加了1/3。粮食产量提上去了，可价格被奸商打压到低至5角钱一担的谷子都没人要，这极大打击了苏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此，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群众入股建立粮食合作社。当新谷上市时，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稻谷，存于粮仓，以备后用。当青黄不接、群众急需用料时，合作社以低于市场价格供应社员，或者销往价高的地方赚取差价，形成利润。合作社在高买低卖之间，增加了社员收入，平抑了物价，得到了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信赖和拥戴。苏区群众由衷地称赞“合作社第一好”！

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战役——高虎脑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宗妍 钟晟

高虎脑红军烈士纪念碑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驿前镇贯桥村街道大坪。纪念碑高12米，碑的正面镌刻着“高虎脑红军烈士纪念碑”10个大字，由曾任红三军团政委、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题书。碑的左侧是曾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三营营长、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的题词：“向高虎脑战斗顽强作战英勇杀敌光荣献身的烈士们致敬！”碑的右侧是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题词：“长征前夕的激战”。碑的底座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高虎脑地域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夺得了第五次反“围剿”关键一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红军的革命大无畏精神。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这场战斗处于非常被动艰苦的境地。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县城失守后，蒋介石以装备精良的十一个师兵力，出动飞机大炮向苏区腹地逼近，妄图在八月占领瑞金。

为了遏制南进之敌，红三军团奉命在高虎脑一线布防。七月二十二日，红军三十四师和少共国际师英勇杀敌于大寨脑；八月五日至七日，红五师、红四师和红三十四师在高虎脑与敌激战；八月十四日，红五师在万年亭重创敌军。经过红军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六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阻滞了敌人侵占瑞金的进程，为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赢得了时间。

在这一战斗中，红五师政治委员陈阿金等二千三百余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他们不愧是革命的精英，民族的骄子！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他们的业绩，与世长存。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广昌县委
广昌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八月五日

碑文主题突出、脉络清晰、简洁明了，记述了高虎脑战役的历史背景、主要过程和重大意义，还原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

残酷与疯狂，红军战士展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钢铁般的革命意志，读后让人感慨万千、心潮澎湃，不禁肃然起敬。

长征前的最后一次阻击战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由于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入频频失利的被动局面。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陷落。之后国民党大军向南推进，企图攻占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形势岌岌可危。

为了阻击国民党军，1934年7月22日至8月29日间，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工农红军以贯桥村的高虎脑为中心，在北至大寨脑、南至驿前地域构筑工事阻击。高虎脑海拔406米，因山形酷似昂首蹲坐的猛虎而得名。贯桥位于赤水与驿前之间，扼控广昌南下石城的咽喉要道，是瑞金北面一个极其重要的凭栏。因此，红三军团选择在这里阻击国民党军。8月，国民党军由北向南发起进攻。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工农红军凭借简单工事、落后装备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其中大寨脑战斗、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最为惨烈。因三次战斗均在高虎脑境内，合称“高虎脑战役”。

一场典型的阵地防御战

1934年7月14日，汤恩伯第10纵队向大寨脑推进。20日进至曾岗岭、天子峰一带构筑碉堡。22日拂晓，敌第4师、89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大寨脑、鸭子岭红军阵地进行疯狂进攻，红34师和红15师奋起抗击，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拿石头砸，展开近身肉搏。战至12时，由于火力不足，被迫向驿前方向撤退。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第34师奉命在高虎脑、贯桥、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实施阵地防御。

8月6日拂晓，敌左纵队第4师、89师向高虎脑主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先以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接着又用大炮猛烈轰击，尔后以步兵密集队形



连续向红军阵地发起一次次冲击。红5师第13团坚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冲锋，红14团则由右翼向北突击敌人，保障阵地翼侧安全。双方血战数个小时，敌第89师进攻失败，伤亡惨重。第二天，敌人在重炮的掩护下，攻克了我军鹅形阵地，使得高虎脑等阵地成为突出部，彭德怀不得不命令各部队撤出阵地，退守万年亭。高虎脑一战，是一场典型的阵地防御战，坚守高虎脑的第13团与友邻部队伤亡超过1600人，敌人三天之内损失超过3000人，敌第89师失去战斗力，敌指挥官感叹此战是“进剿”以来“未有之牺牲”。

8月14日，敌军开始向万年亭发起攻击，以飞机、大炮向万年亭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掩护其步兵实施冲锋。红5师13团3营指战员英勇抗击，先后打退敌人2次进攻，击溃3个团。敌人受挫后，以6倍于红军的兵力，改向翼侧红2营阵地攻击。红2营

沉着应战，接连打退敌人4次进攻。之后，敌人再度集中兵力向红3营主阵地左侧猛攻，红5师师长李天佑命令第二梯队红15团、红14团，各以一部兵力由万年亭阵地西北向敌侧后反击，再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地。8月28日，敌军再次对万年亭阵地猛烈攻击，战况异常激烈。战斗间隙，红5师政委陈阿金与李天佑到前线察看战情。此时，一架呼啸而来的敌机投下一颗炸弹，李天佑被炸伤手，陈阿金壮烈牺牲。红三军团卫生部部长何复生，牵挂前线的救护工作，亲自上前线指挥所观察、了解战斗和伤员救治情况。突然一架敌机俯冲扫射，他身中数弹，当即倒在血泊之中，英勇牺牲。此后，红军为保存有生力量，南撤到驿前庄下一线的第三防御地带，继续阻滞敌军前进。1934年10月10日，红15团撤离瑞金，渡过了都河，从此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我们要统筹“软”“硬”环境建设，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土育肥”。

强化基础设施支撑。总体上说，江西基础设施还存在短板，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需要。我们要以深入实施“项目大会战”和项目建设“四大攻坚行动”为抓手，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江西123出行交通圈”，积极融入“全球123快货物流圈”，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布局，提速建设省级水网先导区。加快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和先进信息、科技、物流等支撑产业升级类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南昌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辐射带动作用，谋划建设江西先进算力中心。深入实施城市功能与品质再提升行动和乡村建设行动，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

加强产业政策供给。当前，疫情对部分产业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产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我们要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增强政策协同性，形成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各项惠企纾困政策的前提下，根据形势变化和经营主体

需求，及时调整优化省内政策，发挥“惠企通”直通车作用，切实做到应享尽享、直速快享。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防止脱实向虚。完善提升产业链链长制运行机制，“一产一策”“一链一策”制定政策方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不动资产负面清单制度，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外商投资权益。

提高政务服务质效。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循序渐近悉心培育起来的。我们要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提高政务服务的精准性和满意度。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持续推进“赣服通”“赣政通”迭代升级，落实“一网选中介”，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新官不理旧账”、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四大专项整治，持续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拖欠账款治理防范和化解等工作。结合大兴调查研究，用好领导挂点、企业特派员等帮扶机制，帮助企业解决用地、用能、用工及融资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全面推行“企业安静日”“首违不罚”“轻微违法不罚”，确保诚信经营“无事不扰”比例达100%，全面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

提升产业发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我